

香港社會企業運動的實踐神學反省

紀治興*

(收稿日期：99 年 3 月 22 日；第一次修正：99 年 10 月 15 日；
第二次修正：99 年 12 月 5 日；第三次修正：99 年 12 月 22 日
接受刊登日期：100 年 1 月 25 日)

摘要

自 2007 年以來，社會企業的發展一直是香港政府每年施政報告的議程項目之一。本文的目的是探討基督信仰群體如何藉社會企業運動尋求社會改變。採用的方法是實踐神學的反思框架，包括參與基督教豐盛社會企業的親身體驗，對香港貧窮問題的社會分析性默想，基督信仰中共享文化的詮釋性默想，和城市轉化的實踐性默想。反思的結論是社會的企業可以有五個其他中小型企業是不會有的獨特競爭優勢，而這些優點是由於社會企業創造社會價值的「意義」。基督信仰群體能夠提供這些獨特的優勢，社會企業運動可以成爲一個平台，讓信仰尋求社會改變。

關鍵詞彙：社會企業，社會改變，神學反省，社會價值

壹·前言

時代論壇在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二日的一篇社評題爲《當不滿聲音衝著教會而來》論道「基督宗教所展示的恩典與救贖，可以衍化爲現實中的社會良知和心靈重建力量，教會和信徒需要身體力行去建構一種典範，才能爲大眾所認受。一般人未必明白聖經的論述，但利他精神和無私奉獻，扶弱助貧和伸張公義，都是普世價值所重視的。唯有在這個基礎我們有所建設和影響力，始能在社會政策的推行和改革上，傳透出一種忠於信仰，福於眾人的價值判斷來。」本文嘗試討論當下香港基督教界可以考慮的一種「忠於信仰，福於眾人」的典範；透過社企幫助香港的邊緣及弱勢群體，彰顯社會良知。

香港政府自二零零六年開始推動社企運動，重點乃幫助弱勢社群，紓緩貧窮。本文是基於親身參與社企的經驗及反省而寫成。框架主要是參考李奧納多·柏夫¹所提出解放神學四個的步驟來論述社企運動：即親身參與、社會分析性默想、詮釋性默想、以及實踐性默想。現實中的思考步驟其實是反方向，

* 作者簡介：紀治興，基督教豐盛社會企業有限公司主席。

¹ Boff, Leonard, and Boff, Clodovis, *Introducing Liberation Theology*. (translated by Paul Burns), New York: Orbis. 1987, pp.24-42.

參與不久便透過跨學科²的角度與其他同行者討論及思考實踐，發覺社企可建構為另類經濟實踐－稱之為「意義」經濟，而背後所需要的另類價值觀在聖經早已存在，最後才以「社會學想像力³」的進路將社企運動在香港貧窮問題中的角色定位。然後再回到實踐方面，以商業生態週期的框架整理社企運動、及以紓緩貧富差距為階段性目標。過程並非線性，更可說是摸着石頭過河。

解放神學的目標是尋求社會改變，所以它與其他實踐神學不同之處是它的重點是社會分析性默想。如何分析所要處理的社會問題之根本成因及可以運用作為解決方案的資源乃反思的關鍵。另外，寫作過程也可說是一個實踐神學的旅程，由以解放神學的框架對一間社企的反思出發，到後來以公共神學的理念在媒體、政府、社福界、及教會中推廣整個社企運動，前後共五年。當中整合了包括在書本內外的知識、及在生活經驗內外的知識；其間既是一種動態實踐過程⁴ (dynamic-practical process)，也是一種行動研究的過程 (Action Research)。

貳·社會企業的概況

廣義來說⁵，社會企業是一個同時擁有社會使命及商業使命的機構；創造社會價值是目標，而創造經濟價值則是先決的生存條件，因為機構唯有至少達收支平衡，才能夠長期持續生存。社會企業既抱著百份百的社會使命，卻也是百份百的營商企業；當一位獲得更生機會的青少年到髮廊⁶當學徒時，他既是在重建自己的人生及尊嚴，也是為髮廊賺錢。同樣地，髮廊也是一邊在履行社會使命，一邊又履行著商業使命。這兩種情況，都正如基督既擁有百份百的神性，亦有百份百的人性。基督為了救人而道成肉身；而社企則是透過「下海」營商，幫助弱勢社群。

² 包括工商管理中品質管理及市場推廣、社會科學中社會資本、教育學中轉化式學習等。

³ Mills, C. Wright,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⁴ 李耀全，*教牧職事的召命：神學、靈性、實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2009年，頁48。

⁵ 社企的簡介，載於維基百科網址：http://en.wikipedia.org/wiki/Social_enterprise，2007年10月31日。美國所用的定義有少許分別：「當業務運作帶有一明顯的目的，就是產生社會價值，那業務便進入了社會企業的範疇。」此定義出自 *Social Enterprise Knowledge Network (2006)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Social Enterprises: Lessons from Business and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 in Iberomeria*. Harvard University. P3.

⁶ 豐盛髮廊是本着僱用更生的青少年為學徒，幫助他們學習一技之長，重投社會。

根據香港社會企業總會⁷在二零一零年三月的調查報告，在香港超過 93% 的社企是非牟利機構⁸。這些機構透過商業的活動去實踐社會使命，然後將所得的盈餘再投放在機構，用作社會服務或發展上。傳統的非牟利機構，要依賴政府資助或私人捐款才可以生存；但成功的社企卻致力營商以賺取盈利，先自助後助人，故這種社會服務並不持續耗掉政府資助或私人捐款，以致這些金錢可用於幫助其他新成立的社會企業。除了能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與傳統的非營利機構比較，社企還有另一重大好處，就是透過提供工作機會，能夠激發受助者自力更生，重建他們的自我形象，幫助他們累積社會資本，賺回尊嚴和自信、亦能獲得社工或宗教團體，甚至其家人及大眾的接納。工作亦提供一種成長的經驗，在知識技能、人際關係、自我認識等範疇漫向成熟。

社會企業一詞始於一九七八年，根據英國社會企業聯盟⁹二零一零年二月的宣言，英國社企營業額達 240 億鎊，等於 2,834 億港元。是國民生產總值的 1.6%；更重要的是這股社企趨勢已銳不可擋。五年前，政府以「伙伴倡自強」基金推動社企，現時香港有大約 330 家社企，營業額約 3 億港元，是國民生產總值的 0.02%，以此計算英國社企對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是香港的九十倍，可以說社企在香港的發展空間可以很大。現時的 330 間社企共僱用全職或兼職約 5,000 人¹⁰，佔勞動人口 0.14% 為有工作能力而沒有競爭力的弱勢社群提供就業機會。假如香港能追及英國的社企滲透率，在就業方面，將會有 45 萬¹¹的人士或家庭受惠。香港大部分的社企正處於起步階段，屬中小型企業，在二零零八年只有 27%¹²有盈利，72%¹³的社企希望有「知識型義工」參與營運，改善產品的質素及推銷。社企面臨最大的內在挑戰，就是要改良產品的質素。根據豐盛的調查報告，以 5 分為滿分，本港社企產品的平均滿意度是 3.6 分，可說是合格但沒有商業競爭力。現時大眾對社企的價值的了解及支持仍然有限。以逆向的角度看，社企運動潛力大但有待拓展。

⁷ 香港社會企業總會， http://www.sechamber.hk/en_introduction.php。

⁸ NGO 即非政府機構，或非營利機構 (NPO)，或第三部門亦是同類型的機構。

⁹ Social Enterprise Coalition, No More Business as Usual: A Social Enterprise Manifesto, February 2010.

¹⁰ 香港社會企業總會 2010 年 3 月的調查報告。

¹¹ 5,000 人 x 90 倍 = 450,000 人，此數字相比本港勞動人口偏高，主因是社企多是勞力密集型。

¹² 香港社會企業總會 2010 年 3 月的調查報告。

¹³ 香港社會企業總會 2010 年 3 月的調查報告。

參·神學反省的框架：跨學科對話

神的原意是人活在世上有豐盛的生命，創世記 1:28：「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神呼召我們去幫助有需要的人，一個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在出埃及記中，神展示如何解放在埃及受壓迫的以色列人。神愛貧苦大眾¹⁴，他們生活在邊緣之中，被社會的大多數人所拒絕或忽視。他們欠缺受教育的機會及面對其他結構性障礙，以致被阻礙從低下社會階層向上爬升。在一九六零年代的拉丁美洲，因為結構性的不公義，人民遭受當權者的壓迫，羅馬天主教團體爲了幫助他們，發展出一套解放神學。

若系統神學致力尋找苦難的原因；解放神學則不只是探究原因，或者解釋當代的經驗；更爲了受苦的群體，尋求解決之道，信仰尋求社會改變。卡爾巴特堅稱：「只有世界的行動者才是真正的聆聽者¹⁵。」而馬克思認爲：「哲學家從不同的方面解釋世界，而重點是要去改變它¹⁶。」楊牧谷將神學簡化爲創造論、救贖論及終末論¹⁷。解放神學是關於救贖的實踐神學，它是要建立一個公義環境，能令人們有機會發展潛能，活出尊嚴，從而改變命運。故它的討論對象並非哲學，而是社會科學及實用學科。

解放神學家需要實際的體驗，以及社會科學的知識，才能夠推動重大的社會改革。解放神學的目標是社會改變，因此神學的起點應是親身的參與。中國人有謂「紙上談兵」，若沒有實戰體驗，要成功改變社會的機會微乎其微。李奧納多·柏夫更認爲，解放神學方法涉及「分析的眼光、神學的判斷，以及牧養的行動。」故此解放神學的框架如下：參與經驗、社會分析性默想、詮釋性默想、及實踐性默想。

根據參與個別社企經驗而作出的反省，是一種雛形的行動研究，從實踐中總結出關鍵元素，以便有的放矢。加上社會分析性默想，則將個別的經驗，放在社會現象背後的因果理論中，由點至面，嘗試推敲出一種改變社會的可能性。詮釋性默想則從基督信仰的資源中，尋求問題的可能出路、及最後方案價值觀判斷。最後的實踐性默想，則從理論、分析、選項等，回到應用和實踐；提出新的行動方案，如假包換的「做」神學 (doing theology)。

¹⁴ 郭鴻標及堵建偉，「新世紀的神學議程，上冊」，香港：香港基督徒學會，2002年。頁348-349。由龔立仁所寫解放神學的文章。

¹⁵ 同上，頁71。

¹⁶ 同上，頁72。

¹⁷ 楊牧谷，「基本信仰與超凡生命（第七版）」，香港：明風出版社，2008年，頁29。

史提芬·貝雲士提倡解放神學應是「一種做神學的方法，建基於知識，在最嚴謹的反省中發展出來。它有助分辨意義，亦對改變社會有所貢獻。因此，它的產生及發展，並不是孕育於過去的文字或做法，卻是孕育於當下的實況及將來的可能性¹⁸。」禰智偉認為「社會企業、社責型投資、社會責任消費、公平貿易這些嶄新的當代現象卻展示了一幅迥異的可能世界的圖象 ... 與上主同工、改變社會，那怕最後未竟全功，但至少我們開始願意改變自己的生活、敢於想像另類的未來。」¹⁹

一、參與經驗：基督教豐盛職業訓練中心

在自然科學的領域，一般是根據觀察而續漸發展出理論，然後是應用和實踐；但在社會科學，尤其是教育及工商管理等實用性學科，更多情況是在日常的實踐中總結出理論，然後再去是應用和實踐。後者可說是一種行動研究 (Action Research) 雛形，其目的不是尋找新知識，而是改良現行的方法²⁰。它的結論不是一種更正確主張，而是一些更好或另闢蹊徑的方法或手段。雖然只是一個個案的經驗，未必能普遍化；但它總能對其他實踐或多或少有所啟發。

(一) 豐盛關懷的社會議題

一九八七年，一群基督徒為了實踐神給教會的使命，創立了基督教豐盛職業訓練中心²¹，宗旨為「藉基督信仰，以企業營運，助更生少年，重投社會。」機構的願景是幫助曾經犯輕微罪行或吸毒的少年人，透過職業訓練及基督信仰，讓他們能夠重新融入正常的生活。現時豐盛營運一間車房、三間髮廊，每年營業額約九百萬元，能夠自負盈虧，員工四十人，其中一半是學徒。

若從經濟角度出發，罪案亦為社會帶來不少負擔。以二零零六年至零七年度為例，政府的數據顯示香港有 81,125 宗刑事舉報，當中 42,000 人被檢控，22,000 人被判監。可能不是太多人會意識到，原來為了這四萬多被檢控和監禁的人，政府每年竟需花上一百零七億港元，其中包括警隊預算防止罪案發生及拘捕疑犯的七十七億港元、律政署處理刑事檢控的四億港元、懲教署囚禁與管理犯人的廿四億港元，社會福利署為犯人提供支援的二億港元。也就是說平均

¹⁸ Bevens, B. Stephen, *Models of Contextual Theology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New York: Orbis Books. 2002, P.70

¹⁹ 禰智偉，「社會企業：富人的福音？」，*教會智囊*，2009年9月10日。

²⁰ Pring, Richard, *Philosophy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London: continuum, 2000, p.133

²¹ 基督教豐盛社會企業，<http://www.fullness-salon.hk/>。亦可參考及香港電臺，「鏗鏘集」，*聲商要有道*，2009年3月16日。

每年要在被檢控人士身上花費二十五萬港元。這些統計讓我們知道，原來罪案問題，也會直接影響庫房開支。

(二) 豐盛的履行其社會使命所立足的變更理論

豐盛的變更理論 (Theory Of Change) 是藉職業訓練讓邊青透過年半 (髮廊)²²或三年半 (車房) 的學徒生活重建自我形象、及學曉一門將來可以賺取超越貧窮綫的收入。豐盛從懲教署或戒毒中心接收犯更生的邊青後，首先會給他們灌輸正面的信念，包括只要肯努力，未來可譜出美麗人生，讓他們看到前面是有成功機會的，藉此引發他們積極的動機；然後便安排他們加入豐盛當學徒，一邊受訓一邊工作。除了知識、技能上的傳遞，還重視他們的生活紀律、學習態度、工作態度、情緒掌控、主動性及人際關係等。工作時間之外，髮型師亦會兼任生命導師之角色，和他們分享分擔生活上的喜怒哀樂，一起同行；而髮廊團契則可以讓他們接觸到基督教信仰，引領他們尋找生命的真正安息處與力量來源。讓他們能夠在被支持的環境中工作，體驗到被尊重和關心²³。

(三) 豐盛個案所揭示社企營商關鍵

豐盛的營商經驗，已總結成爲《營商能耐可以改變社會》²⁴一書以分享其商業營運方法，讓其他社企參考。另外豐盛及友好社企的個案，亦收集於《社企營商二十式》²⁵。社企要能自負盈虧必須找出及發揮其獨特的競爭優勢。社企的社會及商業雙重使命，很多人視之爲兩難 (dilemma)，帶來加倍的難度；但雙重使命其實也提供創新²⁶空間，帶來五種獨特優勢，是與其競爭的中小企所沒有的；若果運用得宜，尤其是有豐富成功營商履歷的知識義工等，社企的財務狀況可以大幅改善。簡述如下：

1. **知識型義工**²⁷：有愈來愈多的專業人士正在尋找機會，將他們的技能和資源貢獻給社會。他們有些已退休或半退休，因此都是有能力和有時間的。但是，那些如定期探訪長者或孤兒的義務工作，並不是他們想做的。幫助社會企業對他們來說是非常吸引的事情，因爲他們能運用之

²² 髮廊學徒需要年半、車房學徒需要三年半。

²³ 學徒的故事可參考亞洲電視，*社區人和事*，《豐盛髮廊》，2009-07-31。

²⁴ 紀治興、鄭敏華，《營商能耐可以改變社會》，香港：思網絡，2008年。

²⁵ 紀治興、楊建霞，《社企營商二十式》，香港：民政事務局思網絡，2010年。

²⁶ Hampden-Turner, Charles, and Trompenaars, Fons, *Building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 How to Create Wealth from Conflicting Values*,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²⁷ 基督教豐盛社會企業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三日發表的知識義工調查，詳情可參考翌日的報導，包括新報、東方日報、太陽日報、成報、經濟日報、文匯報、am730、頭條新聞。

前的專業知識，令社會更美好。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香港每年約六千名月入在四萬至十萬港元間的人士退休；他們不會個個都是管理專才，但以相對現時三百社企這是很好的人力資源。另外，一些年青人追求理想社會，社企亦成爲他們的選項。

2.責任消費者²⁸：調查顯示百分之七十的公眾對社會企業的了解不足，因此對社會企業的支持較環保產品低。但明白了社企的理念後，消費者願意多三倍的購買社企產品、多付約百分之十七至二十一²⁹以支持其社會使命。

3.社會投資者：香港正在興起一批從事金融有關業務的專業人士³⁰、及管理家族慈善基金的第二代，他們正在尋求更有效地運用資金去改善社會，看重的是綜合的社會投資回報，包括所產出的社會效益及財務回報；最理想的情況是二者都有正回報，其次是在能夠在營運上自負盈虧的情況下有社會效益，最後是在相同的資金投放下能產出較傳統社福手段更大的社會效益。

4.商業伙伴：愈來愈多商業機構，伙伴社企以履行其企業社責任；例如煤氣公司與東華三院合作的煮餸易、和海皇粥麵與善導會的有稷計劃。

5.大眾媒體：社企需要媒體去免費推廣產品及服務；另一方面，媒體亦需要社企自助及助人的故事以餉讀者或觀眾。

(四) 豐盛個案所體驗的雙贏關係

知識型義工及責任消費者參與社企的途徑，不是透過「捐錢」，而是捐「才」及「花」錢，即而是捐出才幹及花錢消費，這其中有三重意義。首先，這是讓受助者藉着工作，賺取薪酬和尊嚴，及在工作的環境中成長，是一種更有效的幫助。

另外，這也是知識型義工及責任消費者成長的機會。透過親身接觸前綫的員工或學徒；一方面他們能鼓勵前綫人員，另一方面他們也從前綫人員身上

²⁸ 香港海港青年商會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三日份發表的責任消費調查，詳情可參考翌日的報導，包括新報、明報、星島日報、大公報日報、文匯報、蘋果、成報。

²⁹ 香港海港青年商會的責任消費調查。

³⁰ 豐盛的投資者關志康的故事，刊登於南華早報《Helping teens pays - in a way the stock market does not 》by Agnes lam、《Investors put more money into social enterprises》by Agnes Lam, Martin Wong and Kobi Chan, 2009-11-02.

學習。盧雲神父³¹教導我們，對邊緣人士真誠的同情，是先去聽，後行動；先學習，後幫助。後者是走出自我中心的觀點，自我中心會防礙我們發現自我及透過邊緣人士的生命看到神的作工。同在的事工³²就是與有需要的人在一起，這是一種深入的人與人連結。這對基督徒商人尤其重要，因為他們只慣於處理龐大的財務數字；但同在或與有需要的人「在一起」，將有助他們發現人的靈魂比有多少個零位的財務數字更重要。同在更是一種在貧乏者身上，找尋受苦的基督的操練。

最後，社會企業可以給基督徒商人一個合適的事奉上帝的出路。香港有很多中年的商業專才，他們都希望能運用專業知識及才幹貢獻社會及教會。但由於商業技巧經常被標籤為「屬世」，所以很多中年的中產基督徒都未能運用本身的專才在教會中服侍。社企是作為一個平台，讓知識型義工及責任消費者藉着服侍他人回應上帝給他們的恩賜及對他們的呼召。藉着社企的平台，讓上帝的愛揭示在人間。所以，支持者與社企的關係並不是施與受，而是雙贏的局面。這是因為非零和的分享，不是我的「失」成為你的「得」；而是雙方所得回的，都比付出的多。

結論是社企社會投資回報能較傳統社福手段更大，它有其獨特的營商優勢；而背後的支持者在參與過程中會有另類的意義作為其回報，這可以是一種多贏的關係。

二、社會分析性默想：社會學的想像

二零零九年十月，商業周刊給香港帶來了一個另類的「第一名」³³：在十一個富裕經濟體中，香港富人與窮人的差距是最大的。在香港，絕對貧窮的個案有存在但並不多見，而相對貧窮的問題卻很嚴重。貧富懸殊並不一定意味著官商在道德上的敗壞；即使每個人都出於好意，它們亦會出現。當下香港的相對貧窮問題是由經濟全球化現象引發出來。不公義和甚至結構性壓迫不一定是故意的。它們常常是隱含於社會流行的意識形態中。

(一) 經濟全球化帶來惡化的貧富懸殊、超速的轉變、力弱的政府

目前發展中國家在環球經濟體系中重新分配各自的角色。離岸製造和外包服務的業務量急劇增加，低土地和勞動力成本的國家和城市都在爭佔全球供

³¹ 溫偉耀，《無能者的大能--社會公義與屬靈操練》，基督徒卓越使團，1991年，頁30。

³² 同上，頁86。同在的事工比策略和計劃更重要。

³³ 商業周刊 http://images.businessweek.com/ss/09/10/1013_biggest_rich_poor_gap_globally/28.htm。

應鏈的低中端市場。市場上有更多的競爭者，意味著那些不能在成本上競爭的，唯有在價值鏈中往上爬，否則便會彼淘汰。例如，當越南和柬埔寨開放其經濟，加入全球供應鏈的遊戲，在中國沿海城市如廣東省唯有提升產業的檔次，調整其在全球市場的定位；讓出低端市場予其他內地中西部的城市與越南等國家競爭。這種跨國競爭的現象，在本土的勞動力市場同樣出現；在這個洗牌的遊戲中，隨著成本更低的國家出現，激烈的競爭令產品價格不斷受壓，工資亦被拖低。結果雖然整體經濟是向上，但無論國家之間和國家內部，貧富差距都是在擴大，勞動工人則以更低價出賣勞力。斯蒂格利茨³⁴指出從一九九三年至二零零二年，世界總收入平均每年增加 2.5%；但同一時間，生活在貧困中的人卻增長了近十億人。事實上，貿易自由化導致更多人失業 - 就是為什麼它激起強烈反對。

除了貧富差距的問題外，全球化亦帶來超速的轉變、及力弱的政府。首先，經濟體系全球化的其中一個相關特點是進入全球市場的門檻大為降低，例如透過 eBay 每個人都可以做跨國買賣，一個在全球市場暢銷的產品如 iPad 可以迅速為製造商帶來豐厚的收入和利潤；速度成為商業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結果科技、商品、生活環境的轉變速度超過常人所能追趕或適應。在這個新的國家之間的分工中，低端市場是以成本競爭，高端市場是以知識競爭。在價值鏈中能否往上爬主要是取決於人力資本³⁵。所謂「知識」經濟，是指產品是以內涵的知識原素去競爭的經濟。「知識」的特點是別人很快便學曉；而且很快便出現新的知識。知識工人通過知識和技能賺取生活，但知識的半衰期一般只有幾年。為了保持在就業市場的競爭力，知識工人要不斷的自我提升，終身為工作學習；或加長工作時間，變相的資源增值。企業追求速度，個人被迫追求速度。個人學曉新知識的速度、個人適應社會轉變³⁶的速度、政府的官僚架構回應社會問題的速度等本身都成為問題；簡而言之，解決方案的出現遠遠墮後於問題的出現。

另外，在全球化這大趨勢中，主要動力來自跨國大企業，它們透過將生產搬至最低成本的地方，將產品賣至最大的消費市場以獲取最大的利潤；當中除了美歐等少數國家能夠左右大局外，其餘的大多數國家只能被動地尋找應對之道。貧富懸殊持續擴大是全球的問題，包括香港，只是在香港更加嚴重。香港政府沒有能力阻擋經濟全球化對本地的衝擊，也不想錯過整

³⁴ Stiglitz, E. Joseph,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W. W. Norton & Company, 2003, P.5.

³⁵ 信報月刊，2009年12月，頁32-38。

³⁶ 例如國內經濟增長之快所需要的相關適應。

體財富增長的機會。如何在整體經濟增長和貧富懸殊擴大這兩難中尋出路，是香港政府的挑戰。

(二)心靈上的貧乏

心靈上的貧乏比物質上的貧乏影響更大。最佳例子是不丹，這是一個經濟落後但曾獲選為全球最快樂的國家；菲律賓也是一個經常在快樂指數超越香港的地區。陸鴻基³⁷認為資本家及專業人士的世界觀及倫理觀構成了維繫著資本主義的支配性意識形態。市場本身有其紀律，主要是競爭。市場上人受到重視的角色主要就是企業家、生產者和消費者，各按經濟系統的機制參與經濟活動。然而，在生命中，我們也有很多非經濟的角色要擔當；那些角色對我們的生活、感情和抱負來說都非常重要。但每天工作時間無情的延伸、與及自我增值的壓力，放假則是為了到商場和娛樂場所消費，年中無休。市場至上的思維，籠罩人心，把人心既有的自私意念合理化；但同時也把只知私利的人孤立了起來，孳長了人們無能無助的疏離感。以下是一則故事³⁸可以作為說明：

「我曾經有幾次在醫管局分享社會企業，有一次會後一個顧問醫生上前來，告訴我他很欣賞社企的意念，也想參與，但他忙得連女兒也沒有時間關心，自己很內疚。我覺得他好像《誰挪動我的乳酪》一書中的老鼠，眼前形勢不妙，但卻不敢有所行動去改變，他就像坐在一所打開門的牢房中，覺得自己沒有可能離開；雖衣食無憂，但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亦不能令自己所愛的兒女開心，經年累月帶着一股‘學習得來’的無力感去生活。」

這位五十個多歲的顧問醫生，他的職業生涯非常成功，但他既不能從事他覺得有意義的活動，他更為沒有時間陪伴家人而感到內疚，他大概也只有很少的時間從事自己的愛好和興趣。他有豐富的資產，但並沒有豐富的人生。

若果陸鴻基代表的是「基督抗拒商業文化」，葛霖³⁹代表的則是「基督溶於商業文化」。他認為基督徒要清楚知道自己是被召進入工作中，因為上帝希望每一個人在祂國度裡工作。上帝曾在一個階段呼召我們進入現時的事業，祂

³⁷ 陸鴻基，《心靈何價？資本主義全球化下的教育與心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2009年。

³⁸ 紀治興，*iQuest* 《社會企業家——你的名字是浪漫探險者》2010-10-11。
http://www.iquest.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891&Pid=1&Version=0&Cid=74&Charset=big5_hkscs

³⁹ 葛霖，「天國與財利—葛霖論金融市場」，Vocatio Creation Limited, 2007.

亦可能在另一階段呼召我們離開。在市場上自由競爭，絕不應把結果賦予生死攸關的終極價值。應看為遊戲，而非戰爭。最後，必須認清自己只是管家，在工作中所獲得的資源，並不真正屬於自己。雖然陸鴻基和葛霖對商業文化好像有不同的取態，但他們都表達工作並不是人生的一切。

生活可譬如為四個玻璃球，就是我們的工作成就、興趣愛好、家庭親友、及社會貢獻。兩隻手四個球，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像一個雜技人在任何時間都只能握着一個或頂多兩個球在手中，其餘的要投擲到空中。雖然我們可能會專注更多的時間在其中一個球，我們仍然需要撥出一定數量的時間給其他三個球。否則這三個球將會從空中跌落到地上摔碎。我們不一定能重整破碎了的玻璃球，或另覓新球。在早期的職業生涯，大多數人的精力和時間都投放在追求事業的成功，提高的生活質量。然而，追求成就往往是在有意無意間犧牲其他三個玻璃球。上述的顧問醫生就是一個例子。他沒有時間從事他認為有意義的活動，沒有時間盡父母的責任陪伴孩子成長，他並不快樂；但他認為他不能改變現況、擁有更快樂的生活。他是活在別人的期望以及自己對自己的期望下，認為應該努力工作，尋求最大的成就，但單只是事業成就不能保證豐富的人生。有意義的人生，是讓別人開心，自己過癮。

(三) 相對貧窮問題

香港家庭月入中位數是 17,250 港元，貧窮線被定義為中位數的一半，即 8,625 港元。香港大約有 22% 的家庭共一百二十六萬人活在貧窮線之下，其中五十萬人需要靠綜援生活⁴⁰。然而，在那五十萬靠綜援維生的人當中，其實有二十萬人本身是有工作能力卻沒有競爭力的，他們欠的是機會，於是惟有依賴政府。經過計算後，只要剩下的 78% 相對富裕的家庭願意拿出他們收入的 3% 與貧窮人分享，那麼所有的貧困家庭都可以移到貧窮線之上。

在同一個月，特首曾蔭權在施政報告中說：「香港作為『城市經濟體』，要解決就業及貧窮問題，仍要依靠經濟增長，共同創富。若要維持以福利為主的紓困措施，必須大幅調整稅制，提高稅率，我相信市民不會認同這個做法。羣策羣力推動產業發展，才是治本之道。」但他沒有指出在施政報告中所推動的知識和創意產業是不會僱用這些低技術工人的。

⁴⁰ 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http://www.hkjp.org/focus.php?cid=4&topic=12&id=220>。

表一 十年內政府的公共開支在福府的公範疇增加了兩個百分點

公共開支	教育	福利	醫療	房屋	共
1999-00	21.3%	14.1%	14.6%	6.6%	56.6%
2009-10	22.3%	16.3%	14.8%	4.3%	57.7%

其實需要羣策羣力推動的是施政報告中另外述說的社會企業。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史蒂列茲指出：「中小企是創造就業的基礎。」這是因為大部分中小企是勞力密集型，營業收入主要是用來支付薪金。香港很多社企都是中小企，創辦目的就是為了給這群低技術人士工作的機會；透過一些社企特有的優勢，讓沒有競爭力的工人組成有競爭力的業務，賺取薪金、尊嚴及社群關係。這些特有的優勢包括不求投資財務回報的社會創投基金、協助改善產品質素的知識義工、責任消費市場的需求、及媒體的免費報導及宣傳。香港人其實愛心不少，根據五月份發表的責任消費調查，受訪者願意多付 17%-21% 以支持社企的產品或服務，六月份發表的知識義工調查，受訪義工平均每週用 4.3 小時幫助社企，約相等於每週標準工作 40 小時的 10%。

特首曾蔭權在施政報告中說需要改革的，其實不是稅制，而是價值觀：我們作為公民是可以改變社會，解決貧窮。需為建構的是社會資本體系中的動員及配置機制：讓 78% 相對富裕的家庭能夠參與社企運動，成為知識義工或採購社企的產品或服務；將 3% 貧窮線上的資源送往貧窮線下的家庭。

社會企業展示了一幅迥異的可能世界的圖象，那怕我們最後未竟全功，但至少我們敢於想像另類的未來。

三、詮釋性默想：另類價值觀

第一個世紀的耶穌運動示範了一條改變社會的第一步是改變想法。在“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太 4:17b) 這句口號中耶穌首先提醒猶太人他們所追尋的人生理想、及這個理想不是遙不可及，但為此他們要悔改，亦即是要改變一直以來的想法，重整價值觀。從山上寶訓的八福開始，貫穿福音書大量篇幅都是關於另類價值觀。耶穌是在顛覆當時的文化。

神關心那些受壓迫、邊緣化，及弱勢的群體。路加福音 4:18-19，耶穌說：「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香港所面對的是整體有足夠的財富，但個別家庭的情況差距太大。在扶貧的議題上，聖經的指引是「分享」。在馬太福音 25:40，耶穌重覆對弱勢人士的關

注：「王要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這裏有兩點需要討論：第一，分享文化的基礎；其次，是誰分享的考慮。

(一)「分享多餘」的文化

這裡要反思的有三點：聖經中「足夠」的概念、「剩餘」價值、及價值的「不對稱」性質。「嗎哪」(出 16:31) 是展示「足夠」的概念的一個例子。上帝藉「嗎哪」讓以色列人學習知足，只要儲備足夠的份量就好了，適可而上，多留下的只會變臭腐爛(太 6:19-24)。反過來說，永不知足很容易變成貪得無厭，貪婪亦成爲犯罪的種子。

「當這些恐懼感蠶食你心靈的時候，你唯一的結局就是貪婪地追逐-追逐你能力可以抓得到的一切。你對自己說：“萬一！萬一有意外的時候，我需要有足夠的應付能力啊！”於是你把四壁都堆滿，堆滿了屬於你每寸的空間。⁴¹」

知足不一定是等於清教徒式的生活，正如傳道書 2:24 所說「人莫強如吃喝，且在勞碌中享福，我看這也是出於神的手。」享受勞碌所得不是罪。知足也不一定是等於要將所有財富放棄，黃根春在其《新約聖經財富觀的反思》中指出保羅接納富有者成爲基督徒⁴²，並不一定要放棄所有。約翰衛斯理的名句「基督徒應該努力賺錢，和努力奉獻，幫助有需要的人。」是一種更積極回應上帝恩賜的態度，比爾蓋茨及沃倫巴非特都是衣食足知榮辱的典範。

當有了足夠的保障後，剩餘⁴³下來的便可以運用於有意義的事情上。在路得記中，波阿斯示範了如何運用剩餘下來的麥穗，讓貧乏者透過多勞多得的機制獲得食物。波阿斯是大財主，吩咐僕人在收割之後讓窮人拾取麥穗；對個別更值得幫助者，「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麥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並要從捆裡抽出些來，留在地下任他拾取，不可叱嚇他。」(路得記 2:15-16) 另一方面，路得也不是坐著等人救濟的，而是到田間撿拾麥穗。在帖撒羅尼迦後書 3:11-12，保羅期望人人都盡可能去工作：「因我們聽說，在你們中間有人不按規矩而行，甚麼工都不作，反倒專管閒事。我們靠主耶穌基督，吩咐勸戒這

⁴¹ 溫偉耀，「無能者的大能--社會公義與屬靈操練」。香港：基督徒卓越使團，1991年，頁33。

⁴² 盧龍光、鄭炳釗、張修齊，「聖經的人生：馮蔭坤博士七十壽辰慶賀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2007年，頁162。

⁴³ 在經濟學和會計學中，足夠與剩餘並沒有必然關係。剩餘是指一些可以產生價值但沒有產生價值的資源，結果是浪費。例子包括航機上空置的機位。

樣的人，要安靜作工，喫自己的飯。」弱勢社群若能得到像波阿斯般的富人幫助，就能生活得有尊嚴；而富裕人士亦能免受神的懲罰，這是雙贏的結果。

富者，是已有足夠；貧者，是有所不足。在知足者與不足者眼中，同一事物的相對價值不一樣。同樣的麥穗，它在波阿斯和路得眼中的價值並不對稱⁴⁴。對波阿斯來說麥穗是九牛一毛，但對路得麥穗是維生的食物。同樣的一天，葉忒羅可以休閒地弄孫為樂，也可以用來觀察摩西如何審理以色列民的案子，然後教他設計組織架構及審理流程。同一樣物品，對不同人可以有不同的價值。因為價值的不對稱，自己可能只是付出很小，但別人已覺得獲取很多，形成雙贏局面。

華理克說：「生命本來就是要分享的。⁴⁵」聖經所鼓勵的是分享文化而不是累積文化⁴⁶。追求事業成就是重要的，因為它不單只提供生活上的需要，而且也是培育一個人的主要途徑，包括獲取知識和發展人際關係。問題是那種「永不足夠」的慾望，令人無法抽身；貧乏的生活並不一定是因為擁有很少，而是希望擁有更多。惟有知所適止，我們才能夠過一種能有選擇的生活，成為自己的主人，亦即是時間表的主人。在工作成就上知所適止，就能將時間及精力分配到家庭親友、社會服務、及興趣愛好。富足並不一定是擁有很多，而是想做的都可以做，能夠自我實現。另外，運用多出來的時間、能力及財力，可以幫助有需要的人，對社會有所貢獻。「衣食足、知榮辱」的中國傳統盛世文化價值觀可以說是馬斯婁五層需要的簡化兩層版本。有意義的人生，是讓別人開心，自己過癮。分享文化勝過關懷文化。後者可以止於表態而沒有前者的積極行動。

(二) 分享是所有人的責任

分享是富人及窮人的責任。富人要明白「行公義好憐憫」是上帝要求的責任；而窮人要明白他們也同樣要扶助其他人。一個對上帝有真誠信仰的人，是必然的懂得用托管的態度去看待自己所擁有的財富。嚮往追尋超於物慾的高層次滿足感、以整體社會作為終極性的視野去運用私有財富、願意為他人作出犧牲的情操⁴⁷。華理克說：「真正的團契不只是參加聚會，亦是一起經歷生命，

⁴⁴ 價值不對稱是交易的基礎。

⁴⁵ 華理克，標竿人生，台北：道聲出版社，2003年，頁154。

⁴⁶ 郭鴻標及堵建偉，「新世紀的神學議程，下冊」，香港：香港基督徒學會，2002年，頁358。

⁴⁷ 溫偉耀，「生命的轉化與超拔：我的基轉宗教漢語神學思考」，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

這包括無私互愛、真誠分享、實踐服事、犧牲的付出、同情安慰，以及所有新約聖經中有關‘彼此’的命令⁴⁸。」

神關注所有人，尤其是貧窮人的公平和公義；「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但這公平和公義需要人的合作，因為當人阻擋公平，而神又未有介入，那人便造成了不公平和不公義。在阿摩司的時代，藉著政治和經濟的優勢，當權者和富裕人士享有豐盛物質和財富，以致在弱勢人士身上犯罪，這是受神所譴責的。以色列的富人認為他們的富足是神的祝福；雖然阿摩司作出警告，但他們卻充耳不聞。而阿瑪謝祭司亦認可他們這種看法。其實，神對他們發怒，後來將整個國家毀滅。這群富裕人士中，某些人被嚴懲是因為個人明顯的罪，另一些人則因為無視其在結構性罪中的角色。阿摩司書 5:18-27 記載有關耶和華對以色列將來的公義審判。就是「更多的工作落在阿摩司身上，公平和公義是為百姓的好處，但這好處的代價是犧牲社會的穩定⁴⁹。」以色列將要面對災難，那是耶和華為了行公平和公義而作的。結果是令人震驚的，與挪亞故事的洪水相似。弱勢人士將目睹社會性的破壞，看到耶和華的公平和公義。貧窮人在社會制度的瓦解中只有些微損失，他們感到歡喜，因為上等階層沒落，以致他們不再受壓迫，可以自由地在世生活。

富有並不是罪，亞伯拉罕和約伯都是富有的人，但直接壓迫人，以及被動地參與剝削受壓迫和弱勢群體的政治和經濟體系，那便是罪。神愛貧窮的人，並不代表神不愛富有的人。但行公義好憐憫是所有人的責任而不是選項。以為「好憐憫」是選項，是輕看神的要求。

然而，幫助有需要的人是所有人的責任，窮人並沒有豁免，同樣有責任。只是付出多少及形式有不一樣的考慮。在馬太福音 24 至 25 章的「忠心和不忠人的僕人」、「十個童女」、和「才幹」等比喻都在顯示為奴為婢的也要負責任。在 25 章末的大審判中，耶穌指出要給餓的吃、渴的喝、赤身露體的穿、病的看顧。所付出的可能只是「一杯涼水」(太 10:42)，也可得到賞賜。幫助有需要的人是大審判中分別是往永刑與抑或是往永生的一個標準。總括而言，扶助弱小，不單是政府和富人的責任，也是窮人的責任，亦即是所有人的責任。

⁴⁸ 華理克，標竿人生，台北：道聲出版社，2001年，頁154。

⁴⁹ Jon L. Berquist 的有關論點載於“Dangerous Waters of Justice and Righteousness: Amos 5:18-27”一文中，這出自 *Biblical Studies Alternatively: An Introductory Reader*, New Jersey: Upper Saddle River, edited by Scholz, Susanne, 2003. P.339.

此外，這是責任而不是選項。並不是做了有獎賞，不做也無所謂，而是大審判的一個標準。行公義好憐憫是富人及窮人的責任⁵⁰。

說來有點諷刺，是富人應該向窮人學習分享。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一日經濟學人刊登一篇加州大學的研究結果，指出窮人和富人在慈惠及分享上的取向有明顯分別。窮人認為應該捐出 5.6% 收入作慈善，而富人則是 2.1%。另外在實驗中，窮人總是願意幫助有需要的人，而富人則需要別人提醒才會伸出援手。在一個需要與陌生人分享意外之財時，窮人平均願意 48%，而富人則是 34%。二零一零年五月香港海港青年商會的責任消費調查中，月入二萬元以下的人較月入更多的人願意付較高的價錢購買社企的產品。這種窮人彰顯更多慷慨及關懷他人的現象，可能來自窮人明白他們需要互信互助去渡信困難。其實這種草根階層互信互助的現象，在五六十年的香港很普遍。很多住在公共屋村的家庭，在節期都會準備多一點應節食品予隔鄰較缺乏的家庭；遇到有老弱或病患，則會幫忙家務或照顧孩童。電影「唐山大地震」其中失去丈夫、女兒的主角有一句話是「沒有」的人才明白「沒有」。難怪盧雲神父說我們應該向窮人學習⁵¹。窮人更懂得幫助他人及接受幫助；更懂得「一起經歷生命，包括無私互愛、真誠分享、實踐服事、犧牲的付出、同情安慰。」

四、實踐性默想：更大的社企

企業 (enterprise) 原指一件複雜、冒險的志業。四十年前電視片集《星空奇遇》內的太空船叫企業號，但近年電影《星空奇遇》內的太空船則叫冒險號，其實英文船名一直沒有變。社企 (social enterprise) 不一定是一盤生意，也可以是尋求建立「好社會」(Good society) 的一個宏大、艱難、冒險的企劃；這是「社會企劃」，在美國很多社企是這種著眼於以創新的方法解決社會問題而財政依靠捐獻的社會企劃⁵²。

(一) 社會關懷：城市轉化

在香港最大的這種社會企劃就是轉化這個城市。社企的出發點是一項社會關懷的議題，在社會分析性默想中指出香港的相對貧窮是富裕經濟地區中最差；草根階層面對的是生活上的相對貧窮，而中上層人士亦不一定快樂，心靈

⁵⁰ The Economist, "Wealth, poverty and compassion: The rich are different from you and me", July 31st - August 6th 2010, p. 60.

⁵¹ 溫偉耀，「無能者的大能--社會公義與屬靈操練」，香港：基督徒卓越使團，1991年，頁30。

⁵² 社企有名的“Ashoka”，就是需要捐獻的社會企劃。

貧乏。而在全球化洶湧而至的浪潮中，香港政府處於被動，亦沒有一個強大的政府機器去獨力解決這個問題。

在全球快樂指數的調查⁵³中，香港得 41.6 分，排名第 84 位，中國是 57.1 分，排名第 20 位，而第一位的哥斯達黎加得 76.1 分。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八日英國金融時報指出「財」富或收入超越某個水平後，便不能帶來更多快樂；另外高收入人士多從事高壓活動；而低收入人士則多從事輕鬆活動如交友或休閒，前者比後者更少快樂。快樂不是來自財富而是來自有意義的活動。陽光衛視的創辦人楊瀾分享道：「富，不是擁有很多，而是想到便可以做。」；是在馬斯婁的自我實現層次。而維克多·弗蘭克⁵⁴則解釋：「快樂不能直接尋獲，而是隨著從事有意義的活動而來。」台中市長胡志強總結出：「真正有意義的人生，就是要讓別人開心、自己過癮。」這是雙贏的分享。

基督信仰群體應參與這個城市轉化的運動，正如謝品然⁵⁵指出希伯來聖經的教訓：「主流核心的哲賢如以賽亞、或主流技匠尼希米，各自對國家民族的生存興衰有重大的影響力；邊緣位置上的阿摩司、和耶利米也同樣針對國族的處境和命運，提出了重要的批判與挑戰。」龔立人⁵⁶指出：「靈性不可能只有我與上主的關係，因為上主愛世界。因此，沒有伸延與其他人關係的靈性只是一種封閉，甚至自戀的靈性。... 愛上主就是愛上主所愛。」而上主所愛的是世界。「靈性不是要人逃離世界的不合理，而是帶著基督的生命進入世界，並挑戰它、改造它。」⁵⁷

這個社會企劃的使命可說是：「藉基督信仰，以社企運動，助生活及心靈貧乏者，尋求另類的未來。」這個運動不一定能改地換天、轉化香港，但如能向前推動它這麼一點點，便已發出了先知的呼聲。

(二) 變更理論：「意義」經濟

社企的主要使命是創造社會價值，而這個價值創造的過程所立足的變更理論包括兩個元素：基礎建設的分享文化、和上層建設的跨界別協作。

⁵³ New Economic Foundation, Happy Planet Index Report, <http://www.happyplanetindex.org/learn/download-report.html>, 2009.

⁵⁴ Frankl, Viktor, *Man Search for Meaning*, Boston: Beacon Press, 2006.

⁵⁵ 謝品然，「衝突的詮釋」，香港：建道神學院，1997年，頁155。

⁵⁶ 龔立仁，「糾纏的靈性：社會、倫理與教會」，香港：香港基督徒學會，2006年，頁123。

⁵⁷ 同上。

1. 跨界別的協作

在全球化衍生的問題漸顯露下，甚麼是「好社會」、及如何建立，漸漸成爲熱門議題。美國的米高·愛德華茲⁵⁸提出第一部門的政府有權、第二部門的商界有能力、第三部門的公民社會有心；後者要改變社會，惟有透過在公共空間的言述影響市民，藉市民手中的選票影響政府的立法及施政、藉他們手中的鈔票影響商界如何履行他們的企業社會責任，最後是影響公民社會如慈善團體、教會、學界其他公共知識分子等如何建立好社會。但正如在社會分析性默想中指出香港政府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不像美國政府般可動用不同的政、經、軍、文的手段，或中國的强大政府機器，而是處於被動的位置。正如二零零七年十月十日，曾蔭權發表的第二份施政報告⁵⁹，在有關社企的部分，他提到：「在這個新時代，香港要建立新的關懷文化．．．我競選時提出大力發展社會企業，是要推動政府、民間、商界三方合作，大家拿出最大的誠意，推動社會企業及促進就業。」香港政府在這裡提出的，不是要政府做中間人强行重新分配財富，而是扮演協調者，鼓勵生活條件較好的人士去幫助弱勢社群；包括分享知識、技能，以及資源。他的意思是，讓社會企業成爲激發弱勢社群自力更生的平台，這是雙贏的分享。曾蔭權指出解決貧窮問題的可能性 (potentiality) 是來自官商民三個部門的跨界別合作。

2. 分享的文化

社企其實是一種另類經濟。責任消費者到社企髮廊剪髮，一百元是付給服務，另外二十元是爲了支持其社會使命，因爲覺得幫人有意義。知識型義工付出專業知識及時間，不收金錢報酬，只因爲是有意義的活動。社會投資者不落注藍籌股票而選社企，尋求的不是財務回報而是社是效益。商業機構與社企合作，著眼點是客户會因此覺得他們是良心企業。媒體報導社企故事，因爲讀者和聽象觀眾希望知道更多好人好事。在這五類情況，「意義」是一個重要元素。

所謂「知識」經濟，是指產品是以內涵的知識原素去競爭的經濟。知識產品可以是高科技產品如 iPad、互聯網服務，或主要依賴資訊科技和通信技術的金融和貿易服務，或創意產品如設計和娛樂、或電影如「潛行兇間」等。若果知識經濟是指「知識」是產品中的重要元素，則「意義」可說是社企產品

⁵⁸ Edwards, Michael, *Civil Society (Second Edition)*, USA: Polity, 2009.

⁵⁹ 2007/08 施政報告。內容載於網址：<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07-08/eng/p122.html> dated Oct 31。

中的重要元素。一件事的「意義」是一種主觀的判斷，社企越能夠清晰說明其追求的社會效益 (Social Impact)、所應用的變更理論、和所獲得的社會投資回報，將能夠發揮「意義」所帶來的資源及優勢。這裡所指的「意義」，有兩個層次。表層是社企支持者覺得社企不是追求最大的利潤，而是著眼於建造更美好的社會，為大同努力；所以支持社企是有意義的活動，這是往外看。但往內看，反過來說社企是給予支持者所需要的人生意義。真正的快樂是來自意義，意義可以是來自分享。正如在詮釋性默想中指出一種全民參與的分享文化，附合聖經教導。

(三) 成功關鍵：在公共空間的競爭力

社企運動的成敗取決於其在公共空間的競爭力，能否清晰解釋社企所引伸的意義經濟，從而發揮其五種獨特優勢，招聚相關的社會資源改善社企的質素、擴大市場的需求、提升個別社企的存活率、繼而吸引更多創業家開辦新社企以解決不同的社會問題。謝品然⁶⁰所倡議的公共神學提出建構力和對話力這兩個要素：

「基督教思想在現代社會分化的現象處境裡，要提升在開放空間中的競爭力，需要兩方面的醒覺。一方面我們必須對參與現存言論空間之種種遊戲規則與媒體資訊的應用有所了解與掌握... 另一方面必須提升基督信仰的思想內涵與創造力，好讓我們在現有的處境中擁有社會意義建構力與對話力，這是我們信仰內涵實質的表彰，需要有扎實的而活潑的建構與對話內容，而兩者雙管齊下是必然的策略。」

1. 社會意義建構力

尼布爾·利查⁶¹提出「基督改造文化」(Christ the transformer of Culture)，今天的文化內涵主要是受商業文化所影響。基督信仰群體若是與上帝同工，則要思考如何批判及改造當下的商業文化。宣揚環保的綠色經濟、提倡社企的意義經濟、呼籲團結貧窮人的團結經濟 (Solidarity Economy)、及嘗試整合公營部門與公民社會的社會經濟 (Social Economy) 等，都是以不同的進路，尋求社會改變。而它們的起始點都是批判當下的文化的某處缺憾，但沒有止於此，而是再而構思可能的出路。這是秉承舊約的先知傳統，不單要針貶時弊 (criticizing)，更要描繪出先知的盼望 (energizing)，引領百姓到走向另類未來

⁶⁰ 謝品然，「衝突的詮釋」，香港：建道神學院，1997年。

⁶¹ 尼布爾·利查，基督與文化，臺灣：東南亞神學院協會，1992年。

的路途，這個未來不是根據過去和現在所投射出的未來，而是上帝所應許的未來。

社企運動帶來對未來的盼望。香港政府參照外國成功案例而推介的社企運動作為扶貧的其中一個方案，現時仍在起始階段，主要的推動力來自政府三個基金⁶²的撥款。

下一階段的成長期，關鍵元素是民間力量的加入，包括尋求社企營商的關鍵知識、及責任消費所帶來的市場需求；但先決條件是社企所帶來的意義，和所涉及的分享文化能夠廣被宣揚。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三日的第五份施政報告⁶³提出：「香港目前已有三百多家社企。為凝聚社會各方力量，扶掖社企的發展，政府會開展〈社企之友〉運動，獎勵私人企業為社企提供各種援助，如資助、顧問服務及伙伴合作等。我們會推出社企訓練課程，培育年輕社會企業家。為加強市民對社企的關注和推廣良心消費，我們會舉辦〈社會企業展〉。」運用營商專才改善社企產品的質素，然後大力推廣良心消費的市場，是提升個別社企的存活率的關鍵。

最後是成熟期。當存活的社企大增，便會吸引更多創業家開辦新社企，這時候社會創投基金、私人的慈善基金會、及個別投資者便會湧現。為社企運動提供財政、社會網絡、及知識管理等資源。這個階段的催化劑是社企的社會投資回報的評估報告，以讓投資者揀選有潛質的項目；及慈善團體董事會及體制的更新，以接合社企有別於傳統社福服務的運作模式。

2. 言論空間對話力

對話力有點像崇拜講道，希望聽眾受到激勵而作出改變；但它更考功夫。首先，論述的進路需要更活潑而具有多重性格，能盡量同時照顧理性及感性的受眾；包括獨到而整全的理論或逆向洞見、簡單易記而深刻的符號或故事、具體的數字分析、及成功個案等；福音書中的耶穌是頭兩項對話的高手。其次渠道組合可以多樣化，包括組織學會、講座和會議、比賽或選舉、媒體曝光、學術論壇及研究發佈、著作出版等；規模在注重大眾時亦不忘小象，既可以五千人也可以只是十二門徒。

最後，對象包括政、商、民、教、媒。其中，社企這個議題本身對媒體就有吸引力，只要言之有物，見解深刻，苦於題材缺乏的記者自會報導。其實，媒體就是公共言論空間的主要場地，在媒體的曝光亦成為通往其他政、商、民

⁶² 伙伴倡自強基金、社區投資共享基金、攜手扶弱基金。

⁶³ 2010/11 施政報告。內容載於網址：<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10-11/eng/p145.html>。

的切入點。而政府的決策官員，多有跨部門甚至跨界別的的經驗，但他們同樣渴求現時需要有跨學科的洞見的解決方案。最後，商業機構與商界專才是兩回事，前者行事是基於客觀的商業計算，後者因為個人主觀的人生哲學可能更容易投入。

其實政、商、民、教、媒中都有基督徒，在不同的對話渠道中不難遇見熱心的信徒。反而個別教會的教牧同工一般的生活圈子較狹窄，除部份關心香港弱勢群的傳道人外，很少教會會留意社企運動。故此，若果基督教媒體是發動對話的切入點，則神學院及大型教會是在教會界別引起關注的制高點。現時在公立大學中，已有數間開設了社企的課程；而美國的柏祺大學亦在香港舉辦以神學為基礎的社企碩士課程，而其他本地神學院則只有個別神學生以社企為題寫作論文。神學院的支持可以是介紹社企的概念、鼓勵老師及同學就社企與神學及釋經探討和發表論文，讓社企的神學反省更扎實。下列都是有趣兼有用的題目：

- 1.以道成肉身討論從教會「跨越」到社企
- 2.以解放神學建構社會轉化
- 3.藉社企經驗反省神學實踐
- 4.以公共神學帶領社企運動
- 5.以耶穌運動討論另類的價值觀、另類經濟實踐

大型教會中，播道會的幾個堂會和北角宣道會都舉辦過與社企有關的成人主日學課程。教會可以有四個層次的投入，依次是瞭解、支持、傳播、及參與。瞭解主要是邀請講員分享；支持包括探訪參觀、鼓勵弟兄姊妹成為責任消費者或知識義工；傳播是將社企概念傳揚開去；參與可以是教會直接與社企合作、或自行經營社企。

最後，基督徒社會企業家群體等自身的實踐中反省、在信仰群體中的見證分享，將第一身回應呼召的經驗、及在弱勢社群中尋找耶穌、學習行出來的信仰等，都是感動人心的另類講章。時代論壇在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二日的社論指出：「基督宗教所展示的恩典與救贖，可以衍化為現實中的社會良知和心靈重建力量，教會和信徒需要身體力行去建構一種典範，才能為大眾所認受。一般人未必明白聖經的論述，但利他精神和無私奉獻，扶弱助貧和伸張公義，都是普世價值所重視的。唯有在這個基礎我們有所建設和影響，始能在社會政策的推行和改革上，傳透出一種忠於信仰，福於眾人的價值判斷來。」

肆 · 總結

爲了要獲得成果，解放神學家必須要有參與的真實經驗，包括與受壓迫及邊緣化群體在一起，以及與其他幫助他們改變生命的人士共事，然後確立扎實、簡單易明的議題。藉著跨學科的知識，透過社會分析性默想，面對的議題的因果關係可以在當下的社會政治經濟的制約環境下作系統性思考；另外，亦必須要有從釋經性默想而來的聖經支持；最後以工商管理的框架重新默想整個神學實踐，尋求最大的社會效益，和實際可行的啓發。

一、信仰尋求社會改變

這裡是嘗試從建基於基督信仰，藉社企運動帶來的機遇，爲香港的城市轉化提供另類選項。依次探討香港人生活及心靈上的貧乏、社企作爲一種「意義」經濟、及社企運動在公共空間的論述。有別於系統神學，解放神學期望獲得的成果不是「信仰尋求了解」，亦不是「信仰尋求社會運動」，而是「信仰尋求社會改變」，將信仰正能量入建構社會進程中。社會運動只是途徑，不是終點。終點應該是將受壓迫或邊緣化群體的情況改變過來，讓他們能在有尊嚴和公平的環境下生活。十年前，職場神學開始冒起，但是它非但是自我中心，更認爲現行的經濟架構沒有問題。直到金融海嘯之後，現行以民主資本主義爲基礎的經濟系統及其背後思想才飽受批評。社會企業爲資本主義的改革提供了一個以截然不同的價值系統爲基礎的另類經濟雛形。

二、改變的基礎是分享文化

和修本聖經將「愛人如己」正名爲「愛鄰如己」甚是恰當；「世人」是一個符號，看不見摸不到，透過納稅幫助窮人是很抽離的單向行動；鄰舍是我們看得見的人，能夠直接感受到他們身受的苦楚，過程中我們又可能從他們身上發現耶穌。社企正正是提供別於稅收的分享財富機制。另外，「如己」二字很有意思，它指向利己利人的方向。雙方主觀視爲利之所在的事物，很多時並不一樣，這種不對稱的情況，爲社企帶來創造雙贏的機會；這個雙贏局面是來自交換或交易活動，交易是最基本的經濟活動。

三、基督徒可以是推動社會改變的主力

教會投置閒散了很多「剩餘」的才幹、購買力及資產，社企運動可以釋放這些被埋沒的資源；擅於經營企業的基督徒可以指導一個社會企業如何達到自給自足的境界或是擴張事業；中產階級家庭可以較高的價錢購買優質的社企產品。不是教會幫助社企運動，而是社企運動成爲其中一個平台讓基督徒回應上帝的呼召，參與上帝對世界的計劃，讓愛彰顯在人間。

在香港，豐盛不只爲了幫助戒毒康復者及釋囚而宣揚，更爲了社會責任消費、知識型義工及社會風險投資等相關文化而奔波。這是一種全新的文化。以豐盛的經驗爲基礎，這新文化將同時吸引基督徒與非基督徒，最後成爲共同的文化。禰智偉《教會智囊》中〈社會企業：富人的福音？〉⁶⁴一文中分享道：「社會企業、社責型投資、社會責任消費、公平貿易這些嶄新的當代現象卻展示了一幅迥異的可能世界的圖象 ... 與上主同工、改變社會，那怕最後未竟全功，但至少我們開始願意改變自己的生活、敢於想像另類的未來。」

參考文獻

尼布爾·利查，「基督與文化」，臺灣：東南亞神學院協會，1992年。

民政事務局，「社會企業：團結社會力量，促進社業發展」，香港：民政事務局，2007年。

李耀全，「教牧職事的召命：神學、靈性、實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2009年。

亞洲電視，「社區人和事」，豐盛髮廊，2009年7月31日。

香港電臺，「鏗鏘集」，營商要有道，2009年3月16日。

<http://programme.rthk.hk/rthk/tv/programme.php?name=tv/hkcc&p=858&pid=58086&m=photo&e=88237&page=1#album>

紀治興、楊建霞，「社企營商二十式」，香港：民政事務局思網絡，2010年。

紀治興、鄭敏華，「營商能耐可以改變社會」，香港：思網絡，2008年。

郭乃弘，「關社神學初探」。香港：香港基督徒學會，1998年。

郭鴻標及堵建偉，「新世紀的神學議程，上冊」。香港：香港基督徒學會，2002年。

郭鴻標及堵建偉，「新世紀的神學議程，下冊」。香港：香港基督徒學會，2002年。

⁶⁴ 禰智偉，「社會企業：富人的福音？」，*教會智囊*，2009年10月。

- 陸鴻基，「心靈何價？資本主義全球化下的教育與心靈：基督宗教與中華文化傳統的回應」，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2009。
- 華理克，標竿人生，台北：道聲出版社，2003 年。
- 溫偉耀，「無能者的大能－社會公義與屬靈操練」。香港：基督徒卓越使團，1991 年。
- 溫偉耀，「生命的轉化與超拔：我的基轉宗教漢語神學思考」，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 年。
- 楊牧谷，「基本信仰與超凡生命（第七版）」，香港：明風出版社，2008 年。
- 賴品超，「開放與委身：田立克的神學與宗教對話」。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00 年。
- 謝品然，「衝突的詮釋」，香港：建道神學院，1997 年。
- 謝品然，「開放的文本：聖經學和公共神學關係的初探」，香港：研道社有限公司，2009 年。
- 謝家駒，新愚公移山：十個社會企業創業者的故事」，香港：社企創業者論壇，2007 年。
- 禰智偉，「社會企業：富人的福音？」，教會智囊，2009 年 10 月。
- 盧龍光、鄭炳釗、張修齊，「聖經的人生：馮蔭坤博士七十壽辰慶賀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2007 年。
- 龔立人，「解放神學與香港困境」。香港：香港基督徒學會，1999 年。
- 龔立人，「糾纏的靈性：社會、倫理與教會」。香港：香港基督徒學會，2006 年。
- Bevans, B. Stephen, "Models of Contextual Theology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New York: Orbis Books, 2002.
- Boff, Leonard, and Boff, Clodovis, "Introducing Liberation Theology", (translated by Paul Burns), New York: Orbis. 1987.
- Cobb, B. John, "Becoming a Thinking Christian: If We Want Church Renewal, We Will Have to Renew Thinking in the Church",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93.
- Collins, Jim, "Good to Great and the Social Sectors: Why Business Thinking is not the Answer", Jim Collins, 2005.
- Edwards, Michael, "Civil Society (Second Edition)", USA: Polity, 2009.
- Frankl, Viktor, "Man Search for Meaning", Boston: Beacon Press, 2006.
- Guitierrez, Gustavo, "A Theology of Liberation: History, Politics, and Salvation", Britain: SCM Press, 1971.
- Hampden-Turner, Charlies, and Trompenaars, Fons, "Building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 How to Create Wealth from Conflicting Values",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ocess, 2000.

-
- Mills, C. Wright,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 Nash, L. Laura, "Believer in Business (Chinese translation in 1999) ", Hong Kong: Logo Publishers Ltd., 1994.
- Pring, Richard, "Philosophy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London: continuum, 2000.
- Scholz, Susanne, "Biblical Studies Alternatively: An Introductory Reader", New Jersey: Upper Saddle River, 2003.
- Stackhouse, L. Max; McCann, P. Dennis; Roels, J. Shirley, "On Moral Business: 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Resources for Ethics in Economic Life", Michigan: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 Lib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by Gustavo Gutierrez, 1995, pp.331-338.
- Stiglitz, E. Joseph,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W. W. Norton & Company, 2003.
- Stone, W. Howard; and Duke, O. James, "How to Think Theologically (Chinese Edition) ", Hong Kong: Logos Publisher, 2007.
- The Economist*, "Wealth, Poverty and Compassion: The Rich are Different from You and Me", July 31st – August 6th 2010, p. 60.

The Practical Theological Reflection on the Social Enterprise Movement in Hong Kong

CHI-HING KEE *

ABSTRACT

Since 2007, social enterprises development has been one of the agenda items in the annual Policy Address by the Chief Executive of Hong Kong governmen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was to inform the Christian faith community on how to capitalize on this development for positive societal change. The method adopted was the practical theological reflection framework includes the experience from the case of Fullness Christian Social Enterprise, the socio-analytical meditation on the poverty problem in Hong Kong, the hermeneutical meditation on sharing culture, and practical meditation on city transformation. The reflection concluded that social enterprise can have five uniqu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hat other small-medium enterprise will not have; and these advantages are due to the 'meaningfulness' of the social value creation of social enterprises. Christian community can be well positioned as a source of these unique advantages. The social enterprise movement can be a platform for faith seeking social changes.

Keywords: social enterprise; social change; theological reflection; social value

* Chi-Hing KEE, Chair of the Board, Fullness Christian Social Enterprise Company Limited.